
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⑩

苏轼登州论唐艺“四至”

吴忠波

海风掠山巅，咸腥裹丹崖。斑驳的石刻，在晨光里吞吐着青辉。蓬莱阁卧碑亭内，那方横卧的《书吴道子画后》手迹碑石，似乎一下子鲜活了起来——墨痕起伏如浪，笔锋转折似潮。仿佛间，苏轼如椽巨笔，将唐四家（韩愈、杜甫、颜真卿、吴道子）的艺术精魂，熔铸于登州山海之间。这表明，登州文脉与唐艺绝响，在此赓续。

画斋惊鸿

元丰八年（1085）十一月七日，苏轼离开登州府衙官椅已有半月。海风伴着咸腥，裹挟、熏染着州府官廨。年过半百的苏轼拄着竹杖，正小心翼翼地走出居所。原来，应承议郎史全叔之邀，他友情出场，以观吴道子画佛之珍品。

史全叔，原籍河内（今河南）的文散官，在北宋官僚体系中虽无实职，却在登州官舍辟有书画专藏雅斋。听到苏轼的皂靴踏过青砖地的声响，心跳加速的史全叔确信，就是他，这位学富五车的文豪，才是解读吴道子（约680—759）的知音；吴画“天衣飞扬”之妙，只有他可品味，没有之一。

当苏轼从朱漆栏杆外，带着咸风踏入画斋时，史全叔很难想象，这将是酝酿多时的、穿越时代的艺术对话，整整跨越三百年。只见史全叔捧着檀木匣，递上眼前。打开匣子，吴道子真迹绢本，像是带着盛唐余温而暗香袭人。

掸尘、理卷、观画——苏轼入其斋中，一直两眼放光。毋庸置疑，此画为稀世珍品，他一眼千年，瞬间见分晓：“然世罕有真者，如史全叔所藏，平生盖一二见而已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下同）。苏轼自信鉴别吴道子画作真伪的能力不容置疑：“予于他画，或不能必其主名，至于道子，望而知其真伪也。”

苏轼始终凝眸绢素之中。“天纵其能，独步当世”——唐代朱景玄（841—846）《唐朝名画录》对吴生的评语，此刻在苏轼面前获得了现实印证。

忽有海风穿堂，吹动案上的澄心堂纸。苏轼从磨好墨的砚台上，提笔、蘸墨，写下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下同）。墨色浓淡间，仿佛重现吴生的刀锋笔势：“游刃余地，运斤成风”。其腕底，似乎暗合画圣“横斜平直各相乘除”的数学之美。

天女衣袂，案头翩跹。苏轼仿佛置身开元盛世，分明看懂了吴道子的线条语言：“如以灯取影，逆来顺往，旁见侧出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下同）。当苏轼“盖古今一人而已”的惊叹落纸时，史全叔拊掌欣然，兴奋至极。一时间，仿佛大宋丹崖轰鸣的潮声，正与盛唐九州泼彩的笔墨，一起同频共振。

窗外海雾漫卷，二人于雅舍对坐论谈，由吴画而及唐艺。暮色浸透窗户之时，苏轼倾情长吟，画龙点睛：“诗至杜子美，文至韩退之，书至颜鲁公，画至吴道子……”

一幅道子画，竟能引出文豪的隔代之思、跨艺之想！史全叔由此得知，这哪是区区的一幅名人画，倒像是一个时代艺术宝藏的集成。他敏锐捕捉、用心揣摩，重估了此文的价值，一个前朝的艺术坐标系，正在形成杜甫的沉郁、韩愈的雄奇、颜真卿的筋骨、吴道子的衣纹，最终都汇聚在登州，在他的画斋里。

笔墨轮回

史全叔珍藏的吴道子人物画，再次唤醒苏轼的记忆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十二月，冬雪刚刚覆盖凤翔府的房顶，年轻的签判苏轼，正勒马停在开元寺前。走进寺中，檐角铁马在风中叮当，他的脚步惊起殿内沉积经年的香灰。凤翔的开元与普门二寺的壁间，都有王维、吴道子二人的画像，苏轼正是那次游观时得见，才写下《王维吴道子画》这首诗。

显然，这次他面对的非同一般，而是释迦涅槃壁画的浩荡长卷。“蛮君鬼伯千万万，相排竞进头如鼋”（《王维吴道子画》）的魔幻场景里，吴道子的笔意线条，正掀起视觉风暴，名曰“海波翻”。

嘉祐八年（1063）三月，开元寺的青苔，再次被苏轼的皂靴踏碎。此时，他仰头望见的并非佛陀金身，而是吴道子笔下的惊天气势——“巨鳄吞小鲜”（《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》）。

时生柳枝、肩栖寒鸦，文殊菩萨的奇绝造型，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禅影：“寒月堕清昼”（引句同上，下同）。写给苏辙的诗句，带有寒意，呵气成霜：“纵横固已蔑孙邓”。

元丰元年（1078）的鄆州（山东东平及周边）官舍，四十三岁的苏轼头皮发紧、指尖微颤。只因时任京东路转运使的鲜于子骏（1018—1087），向他

展开了吴道子佛像画卷。真的难以想到，裂痕如“素丝断续”，幻象若“蝴蝶飞联翩”。此画残卷，见于十余年前。那是苏轼在长安陈汉卿家中所见，此刻在京师，又重获新生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苏轼曾讽刺权贵“锦囊千纸何足捐”，此刻面对鲜于氏的赠画：“池上千尺柳”，将心比之，似有愧意，也只能报以会心一笑。

也许是苏公有缘！三十年间，画圣的真容，目不离睛，断续显现。这最终于登州，凝聚成《书吴道子画后》中雷霆般的定论，堪称经典。从此以后，“法度与自由”“形似与神韵”的思辨，便在“地号极边”的山海名邦，被赋予文评平台的地位。或许正是这座濒临小城特有的仙境气质，让唐宋笔墨、文心在此完美相遇。这是苏轼之幸，更是登州之幸！

精神谱系

冬夜，登州宅邸。苏轼书桌上的烛火，常常闪烁而明亮。这天，杜诗线本《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》，又被他翻阅得简断编残。这诗，篇长意深，生涩难懂，他却始终爱不释手。苏轼指尖摩挲着诗卷，忽然拍案惊奇——“江湖多白鸟”的隐喻，在他眼前闪耀着光芒。

其实，苏轼的“四至”论绝非孤立，而是根植于对唐代文艺的深入研究。苏轼的诗风与李白、白居易等人较近，而与弓硬弩坚的杜甫、韩愈之诗，倒有些风马牛不相及。但奇怪的是，苏轼却评杜甫、韩愈诗歌成就高于李白、白居易之上。这似乎难以理解，苏轼追寻的文艺先贤，有一个评判标准，即悲天悯人、刚直不阿和家国情怀。

由登州唐艺“四至”论起，杜甫的“诗史”精神在苏轼笔下获得新生。至少六年间，他逢黄州江涛，又遇登州海浪。他在这些雄浑的气象里，发现少陵野老对“天地有青蝇”的忧愤，始终闪烁在自己的眼前，挥之不去。

那天薄暮时刻，一同僚主簿捧着公文，来到他的居所。进来时，苏轼正研读杜甫诗，本为休息时间，见此“不速之客”，便突然考问起诗中“白鸟”的真意。出乎意料，主簿说，白鸟如蚊蚋，就是贪官，绝不是什么好鸟！

这样的解读让苏轼露出会心的微笑，心里想：“行啊这小子，知音一枚！”由此，知州在后面的工作中，非常厚待

他。确实，这种跨越阶层的默契，比什么传承都显得珍贵。

韩愈有耿介之气，苏轼就在笔端使之复苏，且颇具戏剧性：“潮阳太守南迁归，喜见石廪堆祝融，自言正直动山鬼，岂知造物哀龙钟。”他的这首《海市诗·并序》，与衡山祝祷的韩昌黎，形成隔代的奇妙呼应：两个曾经被贬的文人，一个求云开见岳，一个盼海现蜃楼。

苏轼在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中，抒发对“民不堪命”的控诉，其笔锋如铁，直逼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他在海神庙前的祝祷词里，呐喊着“人厄非天穷”，让唐宋士人两风骨，在北海之境浩然迎风。

苏轼对颜真卿的忠烈之气肃然起敬，他们的血脉相通，却神秘、无言、暗自流动。黄州写就的《寒食帖》，名列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，与鲁公同样的“哭途穷”悲怆。赴任登州途中，适逢幼子遁儿周年忌日，他又闭门抄写《心经》，其颤抖的笔触，与《祭侄文稿》相比，很难不产生时空共鸣！

海雾漫卷的清晨，凛冽刺骨。苏轼在《留别登州举人》“归去先传《乐职》诗”中，说得“五日勿勿守”，却早已埋下了爱国为民的伏笔。因他怀揣着两状，正待进京呈递。后来一首《奉和陈贤良》“不学孙吴与《六韬》，敢将驽马并英豪”，苏轼终将杜甫、韩愈、颜真卿的家国性情，还有吴道子的将士绘艺凝结其中，赋能其上。

后来他在《文说》中，用“万斛泉源”以自况。其滔滔文思奔涌的，正是盛唐传承、北宋接续的千年文脉。而这一切的悟得，或正始于登州那个观画的清晨——史全叔藏的吴道子画卷，不啻是打开整个唐代艺术殿堂的钥匙。

丹崖文心

元丰八年的北海之滨，苏轼常以浪涛为墨，在蓬莱山海中挥毫。当他诗文书画“四至”等二十字，被后世刻入丹崖山上碑石时，唐代艺术史的坐标，就此终于定格、凝固于此，业已千年。

此刻的登州，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打造了为民请命的苏公祠。卧碑亭的《海市诗》与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一诗一文，一碑两面，是天人合一，为艺术并峙。蓬莱阁，已取代赤壁、西湖、超然台，让那个刚经历“乌黄”淬炼的文人，完成蜕变。而他评价吴道子“天下之能事毕矣”时，何尝不是在说自己的艺术人生？

此刻卧碑上的刻痕，让后人在与先贤对比中，留下对他艺术印记，令人目眩：古文与欧阳修并驾，《蓬莱阁记》续写八大家风采；诗歌与陆游齐名，《漫游行》的市井气息里跳动着杜诗的脉搏。

“苏黄米蔡”四大书家，苏轼与其他三位亦师亦友，极尽提携关爱。登州前后，他通过文学家孙觉好友牵线，神交其婿黄庭坚，对其才华大加赞赏。登州返京（1086）时，他们终于首次相见。

登州上任时，苏轼已是米芾的启蒙老师，使其悟出“始专学晋人，其书大进”。二人常互通信问候，交流书画心得。临上任前的七月四日，苏轼题跋力挺蔡襄：“仆尝论君謨书为本朝第一，议者多不以为然。或谓君謨书为弱，此殊非知书者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十九）

苏轼的书法，当时颇具自由意象和个性化，“尚意书风”。黄庭坚曾曰：“苏子瞻书法娟秀，本朝第一。”他自称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，恰似吴道子“出新意于法度”的千年回响。

苏轼奠基文人画论，使中国画极富典型风格。那些怪石墨竹代表之作，苏轼受五代宋初绘画大师李成（919—967）、北宋官员、画家、诗人文同（1018—1079）等影响颇深，已在文人画史中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
《书自作木石》云，当得知离开登州消息后，苏轼“与同僚饮酒日宾楼上，酒酣，作此木石一纸，投笔而叹，自谓此来之绝”。河内史全叔取而藏之。其中“自谓此来之绝”，说明他最好的木石作品，就是在登州创作的。

蓬莱阁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刻入汉白玉碑，即长二丈有余之卧碑，背面为《海市诗·并序》。其中碑文末五行，与正文有别，为突兀的狂草。

金石学家后来发现，这竟然是刊刻时拼凑的《跋吴道子地狱变相》残句。其随心的补笔，反让卧碑成了艺术传承的隐喻——就像金皇统年间（1141—1149）根据南宋使臣所献拓本重刻的往事，文化血脉总能在断裂处重生。

今日再观，当夕照为斑驳刻痕镀上金边时，分明可见艺术史在此转折的轨迹——那是苏轼以毕生修为淬炼的文化绳枢：屹立的碑亭，凝固的刻痕，苏醒为流动的史诗，将“四至”之论化作永动的艺术星河。在今天黄渤海分界线上，唐宋文脉交汇，岂非华夏文明闪耀于登州天人合一的璀璨双星？